

新中国人口七十年: 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

於 嘉 谢 宇

【内容摘要】近 20 年来,第二次人口转变是用于解释全球范围内家庭领域发生新变化的最主要的理论框架。文章通过分析人口普查、1% 人口抽样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包括初婚年龄、同居率、离婚率以及生育方面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的发展与西方有着不同的轨迹,不同方面的家庭行为的变化程度差异较大。结婚与同居这些更为个体化的家庭行为经历了较为剧烈的变化,男性与女性不断推迟进入初婚的时间,同居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养育子女方面,婚外生育与已婚不育仍然非常少见。离婚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整体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文章提出,对我国家庭领域变化的理解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独特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

【关键词】第二次人口转变; 出生队列; 家庭

【作者简介】於嘉,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谢宇,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

Yu Jia Xie Yu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DT) has become a major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explaining changes in family behaviors in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Using data from Census, mini-Census, and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we present 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indicators of the SDT in mainland China, including marriage timing, cohabitation rate, divorce rate, and fertility behavior.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DT have had varying trajectories in China, in comparison to the West. A rapid change has been observed among more individualized family behavior like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both men and women postpone the timing of transition to first marriage; cohabitation increases rapidly. In terms of childbearing, the extramarital childbirth rate and childless rate among married women are still rare. Divorce rate experienced a slow increase across cohorts, yet our prediction implies that it will remain relatively low in the near futu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integrate local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understanding family changes in China.

Keywords: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Birth Cohort, Family

Authors: Yu Jia is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Xie Yu is Professor,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and Sociology Depart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Email: yujiaruc@gmail.com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同居问题成因、特征和趋势研究”(15CRK022)的阶段性成果。

1 引言

经典的人口转变指的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变化的过程,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已经经历了工业化的国家都正在经历或完成了这一转变。然而,在 20 世纪中期,率先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尤其是北欧和西欧社会的人口与家庭领域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离婚率上升、结婚年龄推迟、同居率上升、婚外生育率上升等等。1987 年,Dirk van de Kaa 根据这些新的变化,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这一概念,用以解释生育率为何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预测在经典人口转变完成后,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以及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

然而,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是否可以像第一次人口转变理论一样,是必然的人口发展规律且能够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一些学者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仅仅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延续,是一种“次生转变(Secondary Transition)” (Cliquet, 1991),而所观察到的新的人口现象与家庭行为,仅仅是人们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人口发展的规律。此外,相当一部分人口学者也质疑新出现的这些家庭变化趋势,如高同居率、高离婚率是否是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的真正原因(Coleman, 2002)。针对这些质疑,支持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学者从成因与实证分析出发,一一进行了解答。一方面,学者们阐释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不同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部分,且提出两种人口转变可能在一个社会中同时发生(Lesthaeghe and Neidert, 2006);另一方面,学者们也使用实证资料揭示了这一理论框架对低生育水平的解释力(Kertzer et al., 2009)。

但是,关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目前仍存在一定争议,即第二次人口转变究竟是西欧社会独有的现象,还是在北美、欧洲其他国家以及亚洲同样会出现的现象(Zaidi and Morgan, 2017)。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领域,而家庭行为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Raymo et al., 2015),因此,不同文化的社会是否会产生类似的家庭行为的变化并没有定论。近些年,学者们利用不同国家的调查数据与普查数据对此进行检验,但是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西方与拉美社会,关于亚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整体检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研究更是没有。我国与西方国家和拉美国家在经济结构、社会变迁与文化观念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别,考察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否在我国出现以及不同指标的变化状况将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普适性提供重要的依据。虽然已有一些研究考察了我国家庭与人口领域发生的新变化(郭志刚, 2008; 於嘉、谢宇, 2017),但是综合讨论这些新趋势的研究相对缺乏。此外,第二次人口转变是解释西方国家低生育率现象的重要理论框架,对我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发展趋势的研究,也将有助于理解我国近些年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因此,本研究将基于普查数据和全国性调查数据,检验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的发生情况与未来趋势,并考察我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否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征。

2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成因与表现

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探讨离不开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比较。从成因上来看,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经济与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死亡率下降,尤其是婴儿的存活率有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正式教育系统的建立使得养育子女的成本逐渐上升,基于理性的考虑,夫妻会选择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以达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对于这一人口的变化趋势,人口学家们一致认为每个社会都必经的过程,且将符合同样的发展路径(Coale, 1989)。最终,人们的生育率会下降到更替水平左右,而社会的总人口也达到了一定的平衡。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研究者发现,生育率的下降并没有在到达更替水平之后停止,反而进一步下降到 1.5 左右的水平。除了家庭的小型化之外,人们也不断推迟生育的时间,甚至出现了很

多主动选择不生育的夫妻(Lesthaeghe 20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一方面缘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与自主性增强;另一方面则来自社会中个体主义倾向的上升。这些与第一次人口转变不同的社会驱动力,也正是可以将第二次人口转变区别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重要原因。换言之,第二次人口转变并不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延续,而是不同的人口变化过程,尤其是涉及家庭的变化。本文将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家庭观念的改变、性解放和个体主义这几个方面来具体解释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社会背景与微观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场上男性大量的伤亡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于是众多西方国家开始鼓励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带来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大幅提升。此外,教育的发展和性别平权运动使得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教育机会,女性的教育水平不断接近甚至超过了男性,在校时间也更长。这些变化使得相当一部分年轻的女性不想再早早进入婚姻,而是更期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即便是已婚的女性,考虑到母亲身份与工作的冲突,也往往并不会立刻生育子女。这些变化带来了女性的初婚、初育时间的推迟(Goldin 2006)。

人们家庭观念的变化也导致了家庭从以子女为中心到以夫妻为中心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家庭的重心在于培养子女,并使子女获得向上流动,以增加整个家庭的福利(Ariès,1980)。第一次人口转变中生育率的下降正是家庭基于理性考虑,为了使每个子女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带来的,例如,当前东亚社会中普遍的低生育率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家庭为了集中资源帮助子女获得向上社会流动。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夫妻不再以子女为中心,养育子女也并非家庭的全部功能,夫妻关系成为家庭的中心(Van de Kaa 2004)。考虑到照顾子女的成本与负担,一些夫妻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有时会选择不生育子女,而避孕技术的发展则使这一想法得以实现。

价值观与需求层次的变化则带来了个体主义的兴起,人们更强调自我表达与个人自由。正如Inglehart在《静悄悄的革命》(1977)一书中所提到的,当社会变得富裕之后,人们的需求从生理和安全提升到自我实现层面。年轻一代对权威和传统的社会规则提出了挑战,性解放运动使得性行为不再局限在婚姻以内,婚前性行为得到了认可,婚姻这一传统家庭制度的地位与功能也受到了挑战(Cherlin,2004)。这些观念上的变化导致了家庭组成形式的多样化,婚前同居与婚外生育也逐渐变得普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二次人口转变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社会驱动力并不相同,造成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原因主要是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性观念与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对自我实现的重视导致了家庭领域内巨大的变化。从结果来看,第一次人口转变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婚姻期待。在第一次人口转变发生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婚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制度,也同时是生育子女不可或缺的前提,而第二次人口转变则对婚姻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传统家庭的功能也进一步被瓦解。

接下来,本文将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呈现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表现。在婚姻领域,第二次人口转变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初婚年龄的推迟、结婚率的下降、同居率的上升以及离婚率的上升。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的初婚年龄都在不断推迟(Ortega,2014),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初婚年龄已经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Raymo et al.,2015),非洲一些国家的初婚年龄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有显著的上升(Shapiro and Gebreselassie,2014)。终身不婚现象在北欧社会较为普遍,在美国与东亚社会,婚姻仍然被给予很高的重视,大部分年轻人仍然具有进入婚姻的意愿(Manning et al.,2007; Raymo et al.,2015)。此外,婚姻不再是长期稳定的家庭形式,离婚变得越来越普遍。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国的离婚率都有所上升,尽管水平各不相同,例如,美国有约半数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而日本、韩国等东亚社会的离婚率还相对较低(Raymo et al.,2015)。

同居率的上升则更为显著,在法国、芬兰等国家,超过 3/4 的居民有着婚前同居的经历,西欧与北美国家中,同居率也接近一半,即便在更为保守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近年来也同样观察到同居率的迅速上升(Heuveline and Timberlake, 2004)。造成同居率上升的原因一方面是婚姻制度受到的冲击;另一方面与结婚成本的增加有着很大的关系,年轻世代在没有为婚姻积累足够的物质基础前,往往选择同居作为一种过渡的家庭形式(Manning and Pamela, 1995)。

在生育方面,Lesthaeghe(2010)提出,在那些物质需求已经极大程度得到满足、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的社会中,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人口总量并不会达到一个平衡。从目前世界各国(地区)的生育水平来看,大部分西方国家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以下,东欧和南欧的总和生育率则低于 1.5,只有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或以上(Sobotka, 2008)。由于部分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仍然在经历第一次人口转变,因而其生育率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东亚地区的生育率则处于全世界最低水平,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 1.3。

第二次人口转变给家庭带来的影响还包括将婚姻与生育切割开来,婚姻不再是生育的前提,这也导致很多社会中婚外生育的增加(Ellwood and Jencks, 2004)。例如,美国在过去 50 年间,婚外生育率不断提升,2016 年 15~44 岁的未婚女性中有 4.2% 生育过子女。在北欧国家中,当前有超过一半的生育是在婚外发生的。当然,婚外生育行为在很多社会中仍然较为罕见,比如南欧地区和东亚地区,绝大部分生育行为仍然发生在婚姻关系内。

3 我国家庭的特点:传统与现代并存

在西方文献中,第二次人口转变已经是一个较为成熟的话题,大量研究都在揭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不同社会的表现,以及其中重要指标随时间的变化。我国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讨论还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刘爽等, 2012; 石人炳, 2012)。一些研究针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某一些指标,如初婚年龄、同居率、离婚率等进行了单独的检验,但缺乏对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发展状况的全面考察。此外,我国有着独特的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第二次人口转变这个始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能否被应用于解释我国家庭领域发生的变化,或者我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否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路径也需要进行探究。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有很多显著的特点。第一,人们具有早婚与普遍婚的习俗,父母会在子女年龄较小的时候就安排婚事,而婚姻被认为是一种权利,绝大部分人都需要进入婚姻。第二,婚前性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一旦违反,家族甚至有权利对家庭成员进行惩罚,婚外性行为也会受到强烈的道德谴责,甚至会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制裁(Sommer, 2000),因此,婚前与婚外生育的现象极其少见。第三,养育子女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能,“多子多福”这一生育观念被奉行了超过千年,而我国的生育率在历史上也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第四,在传统的家庭系统中,婚姻是长期且稳定的,离婚的情况极为少见,且只有丈夫可以对妻子提出离婚,离婚的女性受到强烈的社会歧视。第五,我国传统的家庭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较低且没有自主权,正如“三从四德”中“三从”强调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样,女性的行为往往是被动的,听命于父亲、丈夫与儿子。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家庭观念与行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家庭的经济功能被弱化,“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观念也受到了挑战(杨善华, 2009, 2011)。在婚姻领域,1950 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就禁止了父母包办婚姻,鼓励自由恋爱,且女性也被赋予了离婚的权利。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推动的性别解放运动大大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女性被鼓励参与到劳动市场中,且逐步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教育机会,在年轻的世代中,女性的教

育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男性(Zhang and Xie, 2016)。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个体主义在我国也慢慢出现,家庭的权威地位逐渐被瓦解(金一虹, 2010; Yan, 2010)。近些年来,婚前性行为也逐渐被接受(朱安新、风笑天, 2016)。

但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家庭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一方面,对于已婚夫妻,生育子女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较为保守的农村地区,不能生育子女的夫妻会被他人歧视(Zhang, 2006),即便是在城市地区,夫妻们也有着强烈的生育意愿,即至少要生 1 个孩子(张晓青等, 2016);另一方面,家庭仍然是养育子女的最重要的制度,且父母对于子女有着很高的期望,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相关研究数据显示,超过 80%的中国父母期望子女获得大学及以上的学历,且我国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也非常高(徐宏伟、柳皓然, 2013)。此外,我国夫妻的幸福观往往是“向下一代看”,其幸福感也更多受到子女的影响(严静, 2013; 徐华春等, 2018)。

不难看出,在我国当前的家庭领域中,传统与现代是并存的,而人们不同类型的家庭行为,可能既会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而出现变化,也会有着对传统的延续。因此本文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可能呈现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轨迹。由于我国家庭的权威地位被削弱,家庭对子女的约束力下降,因而在推迟婚龄、选择同居等更“个体”层面的家庭行为上,将会出现更为明显的变化。我国传统家庭在当今社会仍然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功能就是对子女的养育,因此,本文认为涉及养育子女的家庭行为在我国目前仍然不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而这些行为主要是指婚外生育与婚内不育。离婚由于既涉及夫妻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也涉及抚养婚内子女,其变化可能处于前述两者之间。

4 数据与测量

4.1 数据

为了描述我国居民家庭行为在代际间的变化趋势,本文主要使用了人口普查与 1%人口抽样调查(即“小普查”)数据。相比于社会抽样调查数据,普查与“小普查”数据的样本量更大,描述性统计结果也更具代表性。具体来说,本研究使用了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四次人口普查长表信息的微观数据,以及 2005 和 2015 年两次 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然而,受问卷长度限制,普查数据对于一些具体信息涵盖不够全面,因此,本文也使用了 2010、2012 及 2014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作为补充。

4.2 变量与测量

本文针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相关家庭行为构建不同的指标分别进行考察。在婚姻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受访者进入初婚的年龄来构建测量指标,以此计算不同出生队列的初婚年龄中位数等。在同居行为的考察上,本研究采用两种测量方式,一种是当前正处于同居状态,另一种是曾经有过婚前同居的行为。前者采用普查数据,根据以往研究的惯例进行近似估计:对于满足户内只有二人、二人性别不同、无亲属关系且年龄差距在 15 岁以内的家庭户,本研究认为户内二人处于正在同居的状态(Bachrach, 1987; Clayton and Voss, 1977)。由于缺乏对于同居的准确测量,这种近似估计可能存在一定偏误,一方面可能误将一些非同居的家庭户纳入为同居家庭;另一方面,短暂同居关系中的一方可能并未被认为是长期家庭成员,进而没有接受调查。虽然存在测量缺陷,但本文认为利用这一近似估计得到的趋势依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问卷中直接询问了受访者婚前同居经历,因而本研究能够据此直接确定受访者是否婚前同居过。对于离婚的测量也分为两种,一是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对婚姻起始时间的询问来计算受访者婚姻存续的时间,二是利用普查数据获取当前是否正处在离婚状态的信息。生育行为的测量包括生育子女数量和是否婚外生育。前者使用普查数据关于育龄妇女生育状况的信息,将生育男孩与生育女孩数量相加,得出受访者总共的生育数量。但是由于历次普查中,仅仅针对已婚女性询问了生育状况,无法了解未婚

生育的情况,因此,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来考察未婚生育行为,即是否未曾进入初婚且生育过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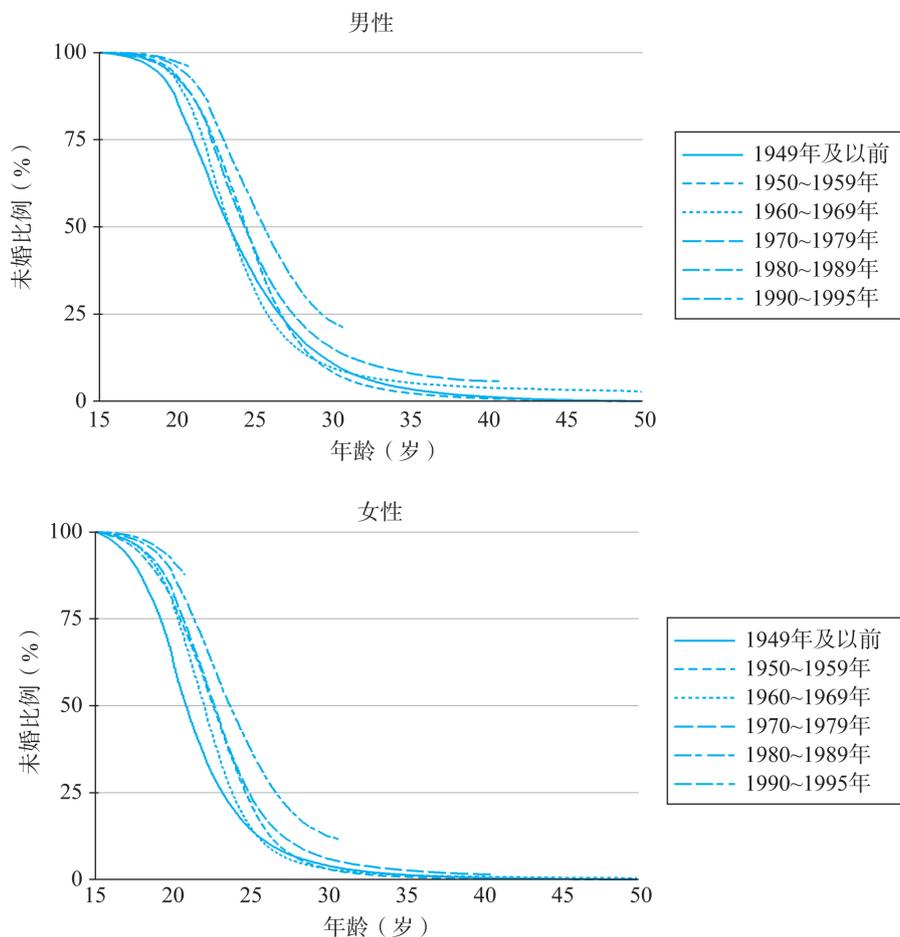
5 数据分析结果

5.1 婚姻

图1显示的是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与女性进入初婚风险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可以看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呈现出初婚年龄的推迟。对于1949年及以前、1950~1959年和1960~1969年出生的男性,仅有不到15%在30岁以前没有进入初婚,而在40岁以前没有进入初婚的比例则仅为5%左右。1970~1979年出生的男性中,进入初婚的年龄已经呈现出一定的推迟,这一趋势在1980~1989年出生的男性中更加明显,约有1/4的男性在30岁时没有进入初婚。类似的,女性初婚年龄也随着代际逐渐推迟。在1949年及以前、1950~1959年、1960~1969年和1970~1979年出生的女性中,初婚年龄推迟幅度并不很大,且在30岁时,仅有不到5%的女性没有进入初婚,终身不婚率非常低,在40和50岁时几乎全部进入了婚姻。但是在1980~1989年出生的女性中,30岁时未进入初婚的比例则达到10%以上,初婚年龄有着明显的推迟。

图1 不同出生队列男性与女性进入初婚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Figure 1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s of Transitions to First Marriage for Men and Women by Coh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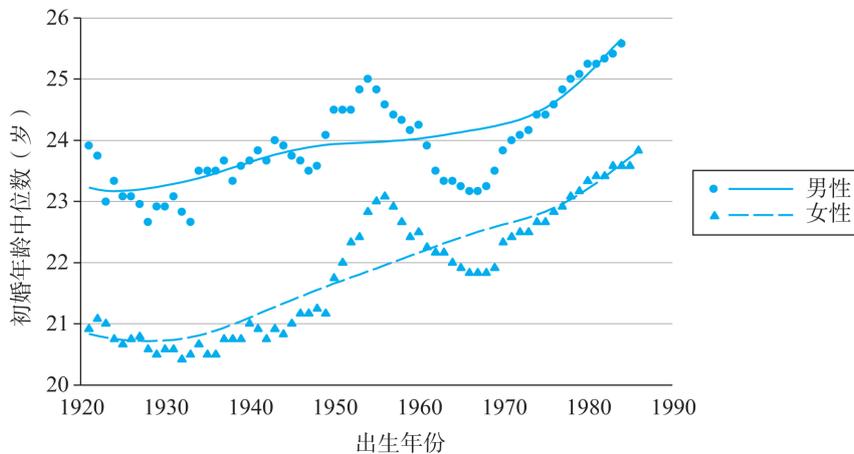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图 2 显示的是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以及拟合的 Lowess 曲线。总的来看,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的中位数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呈现增加的趋势,1949 年及以前出生的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在 20~21 岁之间,男性则在 23~24 岁之间。而在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女性和男性中,初婚年龄中位数则分别上升到了 23~24 岁和 25~26 岁之间。

此外,图 2 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受婚姻与生育政策的影响。在 1950 年代早期出生的男性与女性,其进入初婚的高峰年龄期恰逢我国 1970 年代推行“晚、稀、少”政策。这一政策提倡晚婚,鼓励男性和女性分别在 25 岁和 23 岁以后结婚。由于当时结婚需要单位批准,很多单位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只批准达到晚婚标准的群体结婚,因此便造成初婚年龄的大幅推迟。在 1980 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重新调整了法定结婚年龄,从 1950 年《婚姻法》中规定的男性不得早于 20 周岁、女性不得早于 18 周岁调整为男性不得早于 22 周岁、女性不得早于 20 周岁,并规定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就可以结婚。这样一来,1950 年代后期与 1960 年代早期出生的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便有所回落。但是在 1960 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群体中,初婚年龄则又持续推迟。

图 2 不同出生队列男性与女性初婚年龄的中位数
Figure 2 Median Marriage Age by Gender and Birth Y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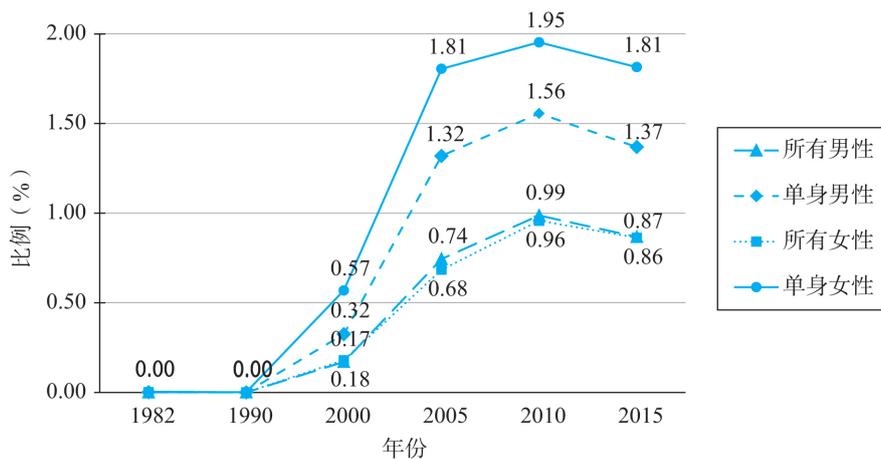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同图 1。

5.2 同居

图 3 显示了 1982、1990、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 20~29 岁的男性和女性中正处于同居状态的比例。由于在人口普查中并没有直接询问有关同居的问题,所以本文采用的是近似估计的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低估,但是从图 3 中仍然可以看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 1982 年和 1990 年,同居极其罕见,男性与女性处于同居状态的比例不到 0.01%;在 2000 年和 2005 年,同居的比例明显增加;在 2010 年和 2015 年,20~29 岁的男性和女性中有约 1% 正处于同居状态,而这一年龄段未婚的男性和女性中,处于同居状态的比例则分别约为 1.5% 与 2%。

图3 男性与女性在20~29岁之间正处于同居状态的比例的变化趋势

Figure 3 Currently Cohabiting Rate between 20 and 29 Years Old by Gender and Year of Observ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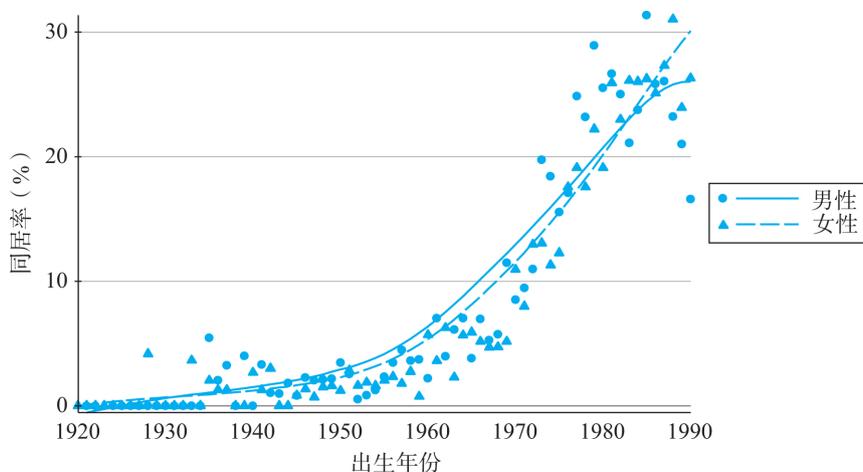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和 2015 年“小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图 4 显示的是男性与女性曾经同居过的比例随出生年份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同居在年老的出生队列中是一个极为罕见的行为,但在年轻的出生队列中逐渐变得越来越普遍。在“80 后”当中,超过 1/4 的男性和女性都有过初婚前同居的经历,且这一比例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等(Pereiro et al., 2014)。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变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同居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实践。

图4 男性与女性曾经有过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随出生年份的变化趋势

Figure 4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Rate by Gender and Birth Year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2010、2012 和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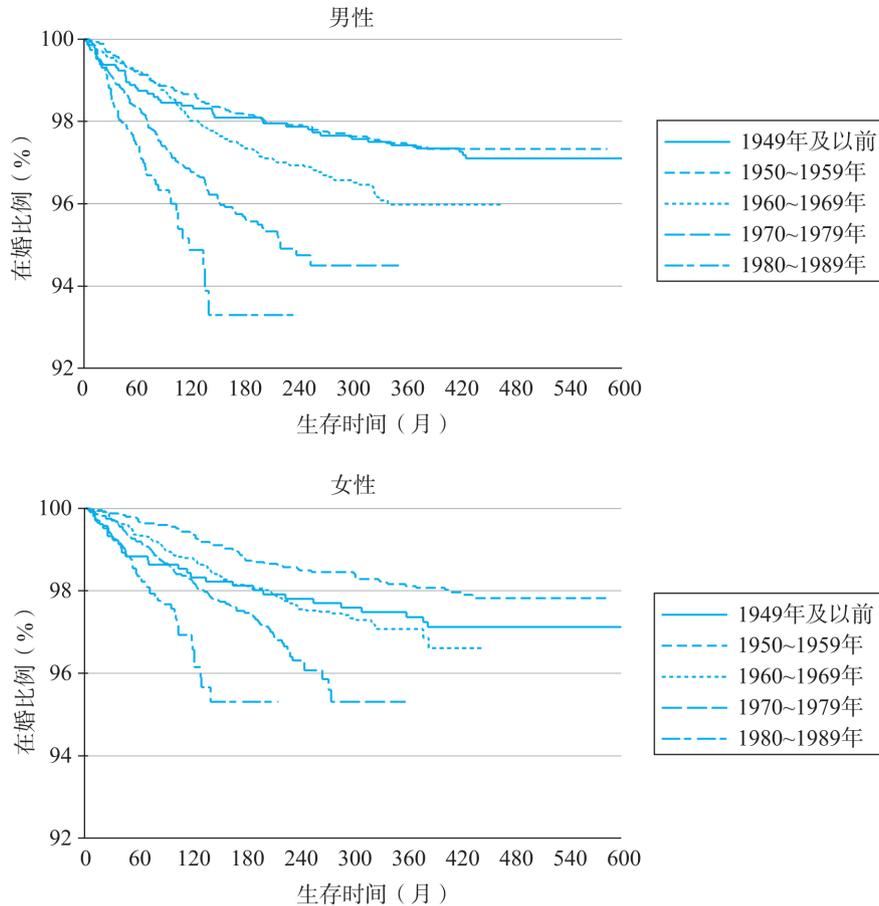
5.3 离婚

图 5 显示的是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和女性离婚风险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 1949 年及以前、1950~1959 年和 1960~1969 年出生的队列中,婚姻的稳定性非常高,终身离婚率不超过 3%。在 1979~1979 年出生的队列中,离婚率有着明显的上升,且婚姻解体的时间也更早。在 1980~1989 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中,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10 年内就有 5% 左右的婚姻解

体。虽然我国的离婚率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而持续上升,但从离婚风险的角度来看,相比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中有接近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我国婚姻的稳定程度仍然较高。

图 5 不同出生队列的男性与女性离婚风险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Figure 5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s of Divorce for Men and Women by Coh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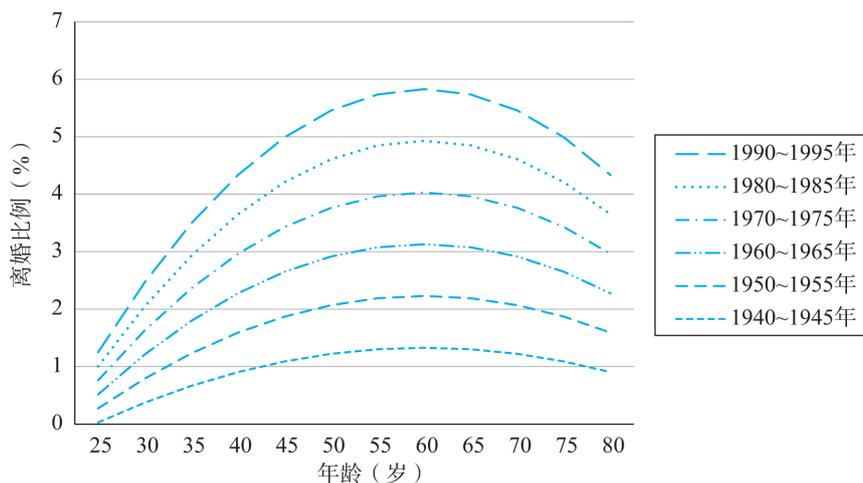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图 6 显示的是根据历次人口普查与“小普查”数据中正处于离婚状态的人口比例拟合出的离婚比例预测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再婚的存在,人口中正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比图 5 中显示的离婚比例要略低。根据对以往数据的观察,本研究假设离婚率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呈倒 U 型,且在各年龄段中,50~55 岁人群的离婚比例最高。根据这一假设拟合出的预测结果显示,在 1980~1985 年出生的人群中,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最高不会超过 5%;在 1990~1995 年出生的人群中,这一比例则不会超过 6%。从预测结果来看,在假设我国家庭观念与社会文化不发生剧烈变化的前提下,本文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离异家庭不会成为我国主流的家庭形式。当然,由于缺乏关于婚姻史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这一预测无法考虑个体层面的相关因素,因而可能存在一定偏误。但根据可观测数据,2015 年“小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已经历婚姻的人口中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为 2.2%,而 2015 年美国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为 14.8%,远高于我国。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离婚率当前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图6 不同出生队列人口分年龄离婚比例的预测结果

Figure 6 Predicted Proportion of Divorced People by Birth Coh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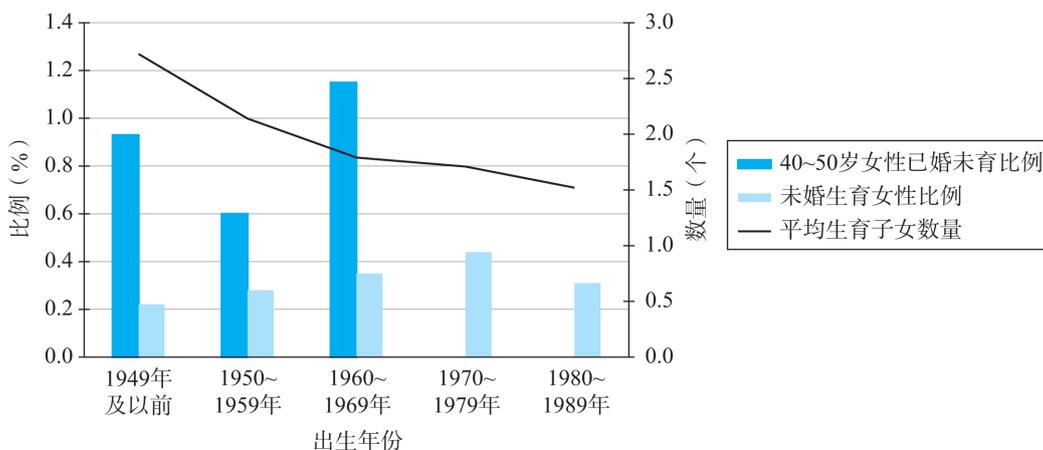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5 和 2015 年“小普查”数据预测得到。

5.4 生育

图 7 中显示的是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生育行为的变化趋势。首先, 平均生育子女数量随着出生年份的推进有着大幅下降, 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致, 即我国的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但由于“70 后”与“80 后”并未完成生育周期, 因而平均生育子女数量并不能代表准确的生育率水平。

图7 不同出生队列女性的生育行为

Figure 7 Cohort Changes in Fertility Behavior



资料来源: 图中数据为本文根据 1982、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2005 和 2015 年“小普查”数据以及 2010、2012 和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虽然生育率持续下降, 但是生育对于家庭的意义仍然非常重要, 已婚女性终身未育的比例非常低。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1949 年及以前、1950~1959 年和 1960~1969 年出生的已婚女性, 在其 40~50 岁时仍未有过生育行为的比例仅在 1% 左右, “丁克家庭”在我国仍然非常少见, 极少数夫妻会选择这一生活方式。

此外,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4 年的数据显示, 我国女性婚外生育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

平,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未婚生育的比例都不超过 1%。这一现象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根据规定,父母需要为未婚生育的子女缴纳社会抚养费,且在子女上户口、入学等阶段都可能面临一定困难;另一方面,我国居民仍然认为婚姻关系是生育与抚养子女的必要条件。正因为绝大多数夫妻都会选择生育子女,且婚姻关系被认为是抚养子女的必备条件,所以子女的存在对于婚姻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使得我国的离婚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6 总结与讨论

第二次人口转变作为解释人口与家庭领域发生新变化的最主要理论框架,在过去 20 年吸引了大量学者开展实证研究,然而对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发生状况进行全面考察的研究则几乎没有。本文基于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指标在我国近些年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且根据我国家庭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一观点,并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表 1 全面总结了本文针对我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相关指标的考察结果。首先,男性与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有着明显的推迟。从初婚年龄来看,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从 1949 年及以前出生队列的 20.8 岁增加到 1980~1989 年出生队列的 24.7 岁,而男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则从 1949 年及以前出生队列的 23.6 岁推迟到 1970~1979 年出生队列的 24.3 岁,而在最年轻的 1980~1989 年出生队列中,在 2010 年人口普查之际还有超过 50% 的男性没有进入初婚。在 1970~1979 年出生的女性中有接近 6% 在 30 岁之前没有进入初婚,男性这一比例则更高,约为 15%。由此可见,早婚与普遍婚这一我国家庭的传统特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表 1 我国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指标随代际的变化趋势

Table 1 Cohort Changes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dicators

出生队列	女 性				
	1949 年及以前	1950~1959 年	1960~1969 年	1970~1979 年	1980~1989 年
初婚年龄中位数(岁)	20.8	22.6	22.0	22.7	24.7
30 岁以前结婚比例(%)	95.5	96.8	97.0	94.1	—
40 岁以前结婚比例(%)	98.9	99.4	99.2	—	—
初婚前同居比例(%)	1.1	1.9	4.9	13.9	25.7
结婚 10 年内离婚比例(%)	0.6	0.6	1.1	1.6	1.5
40~50 岁已婚未育比例(%)	0.9	0.6	1.2	—	—
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个)	2.7	2.1	1.8	1.7	1.5
未婚生育子女比例(%)	0.2	0.3	0.4	0.4	0.3
出生队列	男 性				
	1949 年及以前	1950~1959 年	1960~1969 年	1970~1979 年	1980~1989 年
初婚年龄中位数(岁)	23.6	24.6	23.4	24.3	—
30 岁以前结婚比例(%)	86.0	88.5	90.3	84.9	—
40 岁以前结婚比例(%)	95.2	95.8	96.0	—	—
初婚前同居比例(%)	1.7	2.6	6.0	16.8	24.9
结婚 10 年内离婚比例(%)	0.9	1.2	1.7	2.5	1.8

资料来源:“初婚年龄中位数”“30 岁以前结婚比例”以及“40 岁以前结婚比例”为本文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初婚前同居比例”“结婚 10 年内离婚比例”以及“未婚生育子女比例”为本文根据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40~50 岁已婚未育比例”为本文根据 1990、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1949 年及以前和 1950~1959 年出生队列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为本文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1960~1969 年、1970~1979 年和 1980~1989 年出生队列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为本文根据 2015 年“小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其次,婚前同居在我国变得越来越普遍,在1949年及以前的出生队列中,婚前同居的比例不到2%,而在1980~1989年出生的男性与女性中,约有1/4有过婚前同居的经历。随着初婚时间的进一步推迟,未来我国的同居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再次,离婚率在我国有着小幅度的上升,但总的来说,我国居民的婚姻稳定程度仍然较高。根据本文预测,1990~1995年的出生队列中,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可能不会超过6%。相比于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的离婚率明显更低。

最后,我国居民的生育行为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虽然生育率不断下降且已经位于更替水平之下,但不生育家庭的比例却极低。对于1949年及以前、1950~1959年和1960~1969年出生的女性,40~50岁时已婚未育的比例都不超过1.5%。婚外生育在我国目前也仍然非常少见,在所有出生队列的女性中,生育过子女但始终未婚的情况不超过0.5%。由此可见,婚姻在我国仍然是养育子女的必要条件。此外,在当前我国,生育仍然是婚姻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极少数的夫妻会选择不育子女。一旦生育子女,考虑到婚姻对养育子女的重要性,夫妻也往往会保持婚姻的稳定,这也是本文认为我国离婚率并不会达到很高水平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国正在发生着第二次人口转变,我国的家庭领域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现代化与个体主义的影响,结婚与同居这些更加个体化的家庭行为在我国发生的变化更加剧烈,男性与女性都不断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且不婚率也略有上升,而伴随晚婚这一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同居作为进入婚姻的过渡。受我国传统文化与家庭观念的影响,养育子女这一家庭的传统功能在当今社会依然非常重要,这导致我国涉及养育子女的家庭行为几乎没有变化,婚外生育与婚内不育仍然很少见。我国的离婚率在近年来有所增加,但考虑到婚后生育行为的普遍性以及当前我国婚姻对于养育子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绝大多数已经生育的夫妻仍然会维持婚姻的稳定性,因而本文预测我国离婚率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维持较低的水平。

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除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外,第二次人口转变也是导致我国当前低生育率的重要机制。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一段时间内选择同居作为婚姻的替代,这造成了人们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由于受到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婚外生育仍未被社会与家庭认可,因此我国的高同居率并没有带来大量的婚外生育,而婚姻仍然是人们生育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晚婚造成了女性生育时间的延迟,随之带来的二胎与高胎次生育的减少则使得我国生育率结构性、长期性地低于更替水平。此外,在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传统婚配模式造成了部分群体不婚率的增加,这进一步降低了社会整体生育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的发展有着独有的特征。受传统家庭功能与儒家文化的影响,养育子女依然是我国家庭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已婚女性中依然存在着普遍的生育行为,无孩家庭并未成为主流的家庭类型。在这一“孩子至上”的家庭模式中,父母对子女未来成就有着很高的期望,并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其中便包括维系家庭的完整性。因此,我国离婚率并未被观察到大幅度的增加,相比于西方社会,仍然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本文认为,对人口行为变化的理解应置于我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也有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模式。

除了关注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我国的整体发展趋势,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发生是否在不同群体之间有所差别也值得未来更多的关注,包括不同户口、地区和教育程度的群体家庭行为的变化是否有差异。第二次人口转变对我国其他领域带来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探索,例如进入婚姻时间的推迟如何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大量同居家庭是否将改变人们的居住安排与购房需求等,我们期待未来有

更多研究对这些重要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张晓青,黄彩虹,张强,陈双双,范其鹏.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人口研究, 2016; 1: 87-97
Zhang Xiaoqing, Huang Caihong, Zhang Qiang, Chen Shuangshuang and Fan Qipeng. 2016. Fertility Intention for the Second Child under the Selective and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ies: Comparisons and Implications. Population Research 1: 87-97.
- 2 郭志刚.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 2008; 4: 1-12
Guo Zhigang. 2008. China's Low Fertility and Its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Research 4: 1-12.
- 3 金一虹. 流动的父权: 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4: 151-165
Jin Yihong. 2010. Mobile Paternal Authority: Change in Migrant Farmer Families.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4: 151-165.
- 4 刘爽,卫银霞,任慧. 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 人口研究, 2012; 1: 15-24
Liu Shuang, Wei Yinxia and Ren Hui. 2012. From 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o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Research 1: 15-24.
- 5 石人炳. 人口转变: 一个可以无限拓展的概念? 人口研究, 2012; 2: 11-18
Shi Renbing. 2012.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Term that Could be Expanded Unlimitedly? Population Research 2: 11-18.
- 6 徐华春,崔碧颖,张文婷. 为人父母者更幸福?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3: 538-548
Xu Huachun, Cui Biying and Zhang Wenting. 2018. Does Parenthood Increase Well-be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538-548.
- 7 徐宏伟,柳皑然. 少儿发展.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 183-209
Xu Hongwei and Liu Airan. 2013. Child Development. Zhongguo Minsheng Fazhan Baogao: 183-209.
- 8 严静. 幸福家庭的影响指标体系与解释框架: 人口学视角的解读. 东南学术, 2013; 2: 158-166
Yan Jing. 2013. Index and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Happy Family: Understanding from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2: 158-166.
- 9 杨善华.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三十年——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江苏社会科学, 2009; 2: 72-77
Yang Shanhua. 2009. Post-reform Chinese Rural Famil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Jiangsu Social Science 2: 72-77.
- 10 杨善华. 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150-158
Yang Shanhua. 2011. The Change of Urban Famil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Family Cohesion.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 150-158.
- 11 於嘉,谢宇. 我国居民初婚前同居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人口研究, 2017; 2: 3-16
Yu Jia and Xie Yu. 2017. Prevalence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2: 3-16.
- 12 朱安新,风笑天. “90后”大学生异性交往观念——以婚前性行为接受度为分析重点. 青年探索, 2016; 2: 68-73
Zhu Anxin and Feng Xiaotian. 2016. Dating Ide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of 1990s: Analyzing Acceptance of Premarital Sex Behavior. Youth Exploration 2: 68-73.
- 13 Ariès, P. 1980. Two Successive Motivations for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in the Wes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 645-650.
- 14 Bachrach, A. 1987. Cohabitation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in the US. Demography 4: 623-637.
- 15 Cherlin, A. J. 2004.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 848-861.
- 16 Clayton, R. and Voss, L. 1977. Shacking up: Cohabitation in the 197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9: 273-283.
- 17 Cliquet, R. 1991.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Fact or Fiction? Strasbourg France Council of Europe 2: 85-88.
- 18 Coale, A. J. 1989.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ocial Economics: 16-23.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 19 Coleman ,D. A. 2002. Populations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A Convergent Demographic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5: 319-344.
- 20 Ellwood ,D. and Jencks ,C. 2004. The Spread of Single-paren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60. Working Paper.
- 21 Goldin ,C. 2006.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 Education , and Fami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1-21.
- 22 Heuveline ,P. and Timberlake ,J. M. 2004. The Role of Cohabitation in Family Form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 1214-1230.
- 23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 New York.
- 24 Kertzer ,D. I. , Michael J. W. , Laura B. and Giuseppe G. 2009. Italy's Path to Very Low Fertility: The Adequacy of Economic and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 89-115.
- 25 Lesthaeghe ,R. J. 2010.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 211-251.
- 26 Lesthaeghe ,R. J. and Neidert ,L. 2006.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ception or Textbook Exampl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 669-698.
- 27 Manning ,W. D. , Longmore ,M. A. and Giordano ,P. C. 2007. The Changing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Adolescents' Expectations to Cohabit and to Mar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3: 559-575.
- 28 Manning ,W. D. and Pamela J. S. 1995. Why Marry? Race and the Transition to Marriage among Cohabitors. *Demography* 4: 509-520.
- 29 Ortega ,J. A. 2014. A Characterization of World Union Patterns a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 161-188.
- 30 Pereira ,T. G. , Pace ,R. , and Didonna ,M. G. 2014. Entering First Union: The Choice between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among Women in Italy and Spain.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31: 51-70.
- 31 Raymo ,J. M. , Park ,H. , Xie ,Y. and Yeung ,J. W.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 471-492.
- 32 Shapiro ,D. and Gebreselassie ,T. 2014. Marriage in Sub-Saharan Africa: Trends , Determinants , and Consequenc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 229-255.
- 33 Sobotka ,T. 2008. The Diverse Faces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urope. *Demographic Research* 8: 171-224.
- 34 Sommer ,M. Harvey. 2000. *Sex , Law ,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35 Van de Kaa ,D. J. 1987.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Bulletin* 1: 1-59.
- 36 Van de Kaa ,D. J. 2004. Is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Useful Research Concept Questions and Answers.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 4-10.
- 37 Yan ,Yunxiang. 2010. 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 489-512.
- 38 Zaidi ,B. and Morgan ,S. P. 2017.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A Review and Appraisal.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 473-492.
- 39 Zhang ,Weiguo. 2006. Child Adop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 301-340.
- 40 Zhang ,Yueyun and Yu Xie. 2016. Family Background , Private Tutoring ,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1: 64-82.

(责任编辑: 陈佳鞠 收稿时间: 2019-03)